

从现代世界体系发展演变探析新冠疫情之后的世界走向

——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路径

叶 江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上海 200233)

[摘 要]有关新冠疫情对全球的影响以及疫情后的世界将如何发展已经引起西方和国内学术界的热烈讨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从世界历史和现代世界体系的发生、发展及其在当代演进的角度切入分析,似乎应该能对当前新冠病毒大流行影响未来世界的走向作出某种预测和判断。由于新冠病毒的全球性流行不可能形成冲击乃至否定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体系的革命,也不可能像一战及 1918—1919 年流感大流行和二战那样形成否定主权国家国际政治体系的冲击,因此,世界历史不可能因新冠病毒的大流行而出现根本性的转折,新冠疫情过后我们将继续生活在本质上与新冠病毒全球流行之前相同的世界之中。但是,由于新冠疫情既加剧了现代世界体系中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矛盾,又在相当程度上对缓和这两对矛盾有一定的作用,因此,这两对基本矛盾运动在新冠疫情之中及之后将继续影响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关键词]新冠疫情;世界历史;现代世界体系;基本矛盾;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0.11.001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的爆发,有关此次疫情对全球的影响以及疫情后的世界将如何发展已经引起西方和国内学术界的热烈讨论。美国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在 2020 年 3 月发表了由 12 位知名学者撰写的题为《冠状病毒大流行后世界将会如何变化》的文章,提出了他们各自不同的见解。^[1]《人类简史》的作者、著名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也在英国

的《金融时报》上发表了《新冠病毒后的世界》一文,讨论新冠病毒大流行后人类世界的未来走向。^[2]美国著名外交史学家和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家、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则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引起世人关注的文章《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久地改变世界秩序》,宏观地探讨新冠疫情之后世界秩序的根本性改变。^[3]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作者简介:叶江(1955—),《学术界》本期封面人物,上海松江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二级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民委决策咨询委员,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院教授。曾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三级教授、国际关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所长、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出版专著六部,译著两种;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民族研究》《国际问题研究》《美国研究》《欧洲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世界历史》《世界民族》《学术界》《读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荣获外交部“重大外交政策研究课题”优秀课题组奖一次、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四次。

Rodrik)提出了与基辛格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新冠病毒大流行后世界将继续沿着已有的轨迹前行而不会产生巨变。^[4]而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则非常哲理化地对此作出了独特的反应。^[5]国内学术界则更多地从新冠疫情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之间的关系展开热烈的讨论。^[6]有鉴于此,本文将在学习上述西方大师级学者所提出的观点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观察世界历史和现代世界体系发展演变的角度,以新冠疫情对现实世界的影响作为切入点,从一个侧面探讨此次全球性新冠疫情与世界未来走向之间的关系,以求教于国内对此问题感兴趣的诸方家学者。

一、问题的提出:新冠疫情后人类将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

根据赫拉利的说法,新冠病毒大流行引起的“风暴将会过去,人类将继续生存下去,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将仍然活着,但是我们将生活在一个与之前不同的世界之中”。^[7]同样,《外交政策》杂志所发表的《冠状病毒大流行后世界将会如何变化》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可以肯定的是:正如(冠状病毒引起的)这种疾病摧毁了人们的生活,破坏了市场并显示出政府的能力(或缺乏政府的能力)一样,它将导致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永久性转变……”^[8]当然,对全球的政治经济权力会发生何等永久性转变,该文的12位著名学者的看法则是见仁见智。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认为,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随着公民们寻求国家政府的保护,以及各国和企业寻求减少未来的脆弱性,我们将看到超级全球化的进一步退缩”,并且会导致形成“一个更少开放、繁荣和自由的世界”。^[9]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罗宾·尼布莱特(Robin Niblett)则认为:“新冠病毒大流行可能是压垮经济全球化‘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现在新冠病毒正在迫使政府、公司和社会加强其应对长期的经济自我孤立的能力。”^[10]普林斯顿大

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则认为,新冠病毒的大流行致使国际社会“除了民族主义的加强、大国激烈竞争和战略脱钩以外看不到其他任何东西。但是某种类似20世纪30、4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其他一些政治家在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开始表达的国际主义,也可能缓慢地逆向运行。”^[11]国际关系新制度主义理论创始者小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提出:“新冠病毒的流行显示出我们未能提出适应新世界的战略,而美国将需要一项新的战略。”^[12]

基辛格也是从战略家的视角提出“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久地改变世界秩序”的观点,^[13]并且认为:“美国目前针对新冠病毒大流行危机所做的一切努力具有广泛性和必要性,但是却不应该排挤掉为向新冠病毒流行之后世界秩序过渡而准备的平行规划这样的紧急任务。”^[14]基辛格指出:“尽管可以指望新冠病毒对人类健康的攻击会是暂时的,但是它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可能会持续数代之久。任何国家,甚至美国都无法纯粹用本国的努力来战胜该病毒。当前所必需做的各种应对必须最终与全球合作愿景和计划相结合。”^[15]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前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也就新冠疫情对世界的影响在《金融时报》撰文指出:“我们正在经历的不止是戏剧性事件,而是很可能成为历史的转折点。”^[16]

然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则发表题为《新冠病毒将重塑世界否?》的文章认为,由新冠病毒大流行所引发的危机使得世界各国所拥有的政治特征显得更为明显,各个国家都变成了自身的夸张版本。因此,“这场危机可能不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会成为全球政治经济的分水岭。危机可能会加剧和巩固已经存在的发展趋势,而不是促使世界走上截然不同的轨迹。”^[17]更值得注意的是,德国著名哲学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人物哈贝马斯却提出了与上

述西方学者们大相径庭的观点,他认为新冠疫情的社会后果无法预见。^[18]2020年4月7日,在就新冠病毒危机的影响接受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编辑马库斯·施韦林(Markus Schwering)的采访中,哈贝马斯在回答“您如何体验这场新冠病毒大流行危机?”这一问题时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危机带来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仅涉及难以确定如何应对这一新的流行病,而且还涉及我们完全无法预见它会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就这一点而言,除了知道有此病毒之外,我们所知道的就是目前没有专家能推测出这场危机的各种后果。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专家们应该对粗枝大叶的预测持保留态度。有一点可以明确地说:我们从未如此地了解我们的无知。”^[19]

西方学者们对新冠疫情后世界是否将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不同看法,尤其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对新冠病毒大流行可能造成的后果持某种不可知论的态度,无疑给我们提出了两个值得思考的深层次问题:我们究竟能否预测本次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对全世界的影响?新冠疫情是否会从本质上彻底改变当前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窃以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从世界历史和现代世界体系的发生、发展及其在当代演进的角度切入分析,我们似乎应该能对当前新冠病毒大流行影响未来世界的走向作出某种预测和判断,虽然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所持的态度似乎并不支持这样的看法。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新冠病毒引起的危机之后的世界就必然会如同小约瑟夫·奈、亨利·基辛格等西方自由主义或现实主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家所预判的那样,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或如同一向标新立异的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所说的那样,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的世界将是一个与之前决然不同的世界。

二、厘清现代世界体系的发生、发展有利于预判 新冠疫情后的世界走向

哈贝马斯认为当前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社会

后果无法预见,并且强调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预测新冠病毒造成危机的影响方面应该谨言慎行。然而,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要从历史唯物主义观出发,人们是能够探索出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并进而对各种重大历史或现实的事件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作出科学判断的。就如恩格斯所作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20]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似乎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通过考察分析世界历史及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发展及其现状来确定是否能预测新冠疫情大流行对未来世界发展的影响。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和历史学者们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本次因新冠病毒引起的全球性疫情分别与1347至1353年席卷整个欧洲被称之为“黑死病”(Black Death)的大瘟疫,以及1918—1919年流感大流行(Influenza Pandemic of 1918—1919)^[21]作比较,试图从比较历史的层面探索流行性瘟疫对人类历史乃至现实世界的影响。然而,实际上,从探索新冠病毒大流行对未来世界发展变化的影响角度看,将发生于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与当前的新冠疫情进行类比并不十分恰当,而在一定程度上将发生于20世纪初的1918—1919年流感大流行与当下的新冠病毒大流行进行类比相对更有意义一些。

波士顿大学历史学教授肯·蒙德谢恩(Ken Mondschein)所撰写的相关文章的标题明确指出:“新冠病毒不是黑死病。”^[22]他认为尽管2020年新冠病毒大流行与当年欧洲的黑死病(鼠疫)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新冠病毒流行病与当年鼠疫流行病却又是完全不同的。这不仅因为新冠疫情是由病毒而不是由细菌引起的,且两者的死亡率差异很大:冠状病毒感染者的死亡

率约为 3.3%，未治疗的鼠疫导致的耶尔森氏菌的淋巴结感染的死亡率约为 50%，未经治疗的鼠疫引起的肺炎（呼吸道）或败血症（全身感染）的死亡率为 100%；^[23]更为重要的是，新冠病毒大流行与中世纪欧洲的鼠疫大流行的时代背景截然不同，两者间的流行范围也不同，前者毫无疑问发生于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的进程和现代世界体系之中，而后者则发生于世界历史形成之前的前现代区域性欧洲中世纪历史之中，并且前者是全球性的流行病，而后者则是局限于欧洲的瘟疫。从这个意义上说，将 1918—1919 年流感大流行与当今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作比较显然更具现实意义，因为两者均发生于现代世界体系之中，虽然时间上相差百年。由此观之，厘清现代世界体系的发生与发展对考察、分析和预判新冠疫情对未来世界走向的影响很有价值。

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于马克思所言的人类历史由地域性向世界性的转化。马克思指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24]很明显，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指的就是从 15 世纪开始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推动者就是资产阶级，“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5]由此，人类的这种超越区域性的普遍交往导致人类的历史从原有的区域性历史一步一步地向世界历史方向发展，现代世界体系也就由此而开始形成。

现代世界体系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使人类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的过程中而逐渐形成的一个包括经济、政治乃至文化的全球性体系。根据

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创立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看法，现代世界体系有两个构成成分：其一为以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其二为独立国家（主权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现代国家体系，也就是现代国际政治体系。^[26]然而，现代世界体系实际上是经过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之后才逐渐从西欧一隅扩展形成为全球性的体系。沃勒斯坦指出：“1450—1640 年是个富有意义的时间单位，在这段期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在西欧）创立起来了。诚然，用布罗代尔的话来讲，这个世界经济体是‘巨大而又微弱的’。”^[27]另一方面，与世界经济体系相对应的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体系则是在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后正式形成的，当时也仅局限于西欧。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28]源自于西欧的由世界经济体系与国际政治体系共同组成的现代世界体系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展过程中最终成为全球性的体系。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是现代世界体系成为全球性体系的时段。当时，列宁在其著名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深刻分析了世界历史在那一时期的发展特征，认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而恰恰在这一阶段，“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29]事实也正是这样，当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之后，现代世界体系的全球性就凸显了出来。在相当程度上，正是因为现代世界体系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发展到垄断阶段才真正展现出全球性，所以一部分中外学者认为全球化就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才逐渐形成的，^[30]比如英国学者查尔斯·洛克（Charles Rock）就提出：“我认为，全球化不过是帝国主义

的另一名称。”^[31]

虽然,全球化的缘起迄今依然是一个在学术界言人人殊的问题,但是,这样的一种有关全球化缘起的观点似乎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类进入世界历史之后,现代世界体系从西欧一隅最终演化为全球性体系的发展轨迹。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之后,一方面,不论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还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体系都开始全面地主导全世界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即无论东西南北,人类的活动都受到现代世界体系本身内在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逻辑或矛盾运动之约束;另一方面,也正是在现代世界体系内部经济政治矛盾运动的作用之下,人类的战争行为以及流行病的传播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全球性的,前者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后者则是著名的1918—1919年流感大流行。

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人类进入世界历史而形成的现代世界体系真正成为全球性的体系之后,其内在发展演变的动力却并没有变化,依然是其形成之初就已经存在的最为基本的两对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和主权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间的矛盾。当然,现代世界体系内的这两对基本矛盾自该体系发展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体系之后,也就成为世界性的遍及体系内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最为基本的矛盾。这就意味着,至此之后,这两对基本矛盾决定着全球的经济政治乃至社会文化发展的走向,对现代世界体系内的各种全球性的重大事件,诸如世界经济危机、世界大战乃至全球性瘟疫等,产生直接的作用与影响。同时,这些全球性的重大事件的发生、发展又反过来形塑现代世界体系内的这两对矛盾以及该体系自身的发展演变。实际上,当今新冠疫情与现代世界体系的发展以及该体系中两对基本矛盾的运作也紧密相关,因为迄今我们依然生活在马克思所定义的世界历史之中,也就是生活

在从15世纪末16世纪初从西欧一隅兴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全球性的现代世界体系之中。这也就意味着,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视角出发,深入探讨分析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全球性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之后对体系内部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和主权国家国际政治体系产生巨大冲击的事件及其影响,以及对现代世界体系在当前发展演变的特点作深入剖析,应该是研究和预判新冠疫情对未来世界走向影响的不二法门。

三、全球性现代世界体系及其当前发展与新冠疫情后的世界

毋庸置疑,自现代世界体系发展成全球性的体系之后,被称为对世界历史发展产生所谓转折性影响的重大事件不一而足,其中包括1914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1918—1919年流感大流行、1929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1939至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1989至1991年冷战的终结,以及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等,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当数一战和二战及在一定程度上与一战关系紧密的流感大流行。之所以如此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在所有这一系列事件中,只有一战和二战对现代世界体系中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和主权国家国际政治体系,以及现代世界体系内在的两对基本矛盾产生实质性的冲击,而流感大流行因其与一战之间的紧密关系也略具这方面的作用。

众所周知,人类历史上的一战和二战是全球性现代世界体系中两大基本矛盾的冲突与斗争无法缓解而产生的结果,因为当时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世界市场经济领域和主权国家国际政治领域不仅缺失至高无上的权威——世界政府,而且各大国都不愿意为缓解这两对基本矛盾的剧烈冲突,稳定动荡不宁的世界经济和政治体系而提供公共物品,最终导致各大国为解决经济危机、

争夺世界市场而不惜在全球范围内兵戎相见。^[32]在很大的程度上,发生于1918—1919年的流感大流行也与此紧密相关。1918—1919年的流感大流行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紧密相关,主要发生了三波:第一波发生在1918年春季;第二波是最致命的,发生在1918年秋季和初冬;第三波发生在1918年年底,一直延续至1919年春。在该流感大流行的后两波中大约一半以上的病死者为20~40岁的青壮年。^[33]毫无疑问,一战最后一年1918年参战国跨洲大量运送部队是引起流感大流行的直接原因,由于一战本身就是全球性的现代世界体系内在基本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因此,这一人类历史上首次全球性瘟疫的大流行也与现代世界体系中两对基本矛盾的运作相互关联。

然而,对我们而言,为预判新冠疫情对世界未来走向的影响,确定新冠疫情后我们是否将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之中,更为重要的应该是研究现代世界体系成为全球性体系之后,诸如一战(包括1918—1919年流感大流行)和二战对现代世界体系本身及其内在的两对基本矛盾的运作产生了何等的影响,以及深入分析现代世界体系在20世纪冷战终结之后和进入21世纪之后发展演变的特点。之所以需要这样做,是因为不论是一战还是二战,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当年的流行性大流感都被视为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转折性影响的大事件,深入观察这些重要事件对现代世界体系的影响有利于通过比较来探索新冠疫情对现代世界体系的影响;另一方面,当下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全球环境,即现代世界体系的现状,也是考察分析新冠疫情对未来世界走向的重要因素。

列宁在1917年5月所作的《论坚强的革命政权》一文中指出:“如果没有战争,俄国也许会上几年甚至几十年而不发生反对资本家的革命,但在有战争的情况下,这在客观上就不可能了。”^[34]很明显,列宁这里所说的战争就是由现代世界体系发展至全球性之后,其内部的生产社

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及国家与市场这两对基本矛盾而引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称雄争霸的一战。更重要的是,根据列宁的分析,这场战争不仅在客观上使得俄国迅速发生反对资本家的革命,而且使得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终结生产社会化与资本私有制及国家与市场之间的根本性矛盾,乃至最终彻底埋葬现代世界体系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成为可能。因为根据列宁的看法,导致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35]事实也正是这样,一战不仅导致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在十月革命之后形成了以德国革命和匈牙利革命为代表的一系列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不仅如此,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在一战后蓬勃兴起,并且以连接东西方革命运动从而推翻资产阶级的世界秩序、代之以社会主义制度大厦为终极目标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也在一战结束后不久的1919年3月成立。列宁在《关于共产国际的成立》讲话中指出:“现在,人人都懂得了‘苏维埃’这个词的含义,这样,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有了保证。今天在座的同志们曾经看到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现在又看到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成立,将来他们一定还会看到世界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成立。”^[36]

毫无疑问,由一战所引起的俄国十月革命和随之而兴起的世界革命——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共产国际的建立对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不仅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体系风雨飘摇,而且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体系也面临解体的挑战。在很大的程度上,1918—1919年流感大流行对一战的进程以及与一战紧密相关的世界革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18年9月,美国大海兽号军舰载着9000名美国步兵前往法国,第二波大流感再一次袭击欧洲。由于处于战争状态,各参战国政府刻意隐瞒大流感疫情,导致流感疫情更加恶化。持续了四年之久的一战,也在这一流感高峰期出现了重要转折点。同盟国的主要国家德国

的军队在流感和协约国军队的双重打击下,损兵80万,士气十分低落,食物和燃料的短缺使德国人口容易受到席卷整个欧洲的流感大流行的影响。仅在10月18日,柏林当局就报告了1700例流感死亡病例。^[37]原定发动的对协约国左翼的进攻,也因为流感而取消。从9月开始,同盟国中的保加利亚、土耳其和奥匈帝国先后退出战争。10月,德国统治集团试图孤注一掷下令基尔港的德国远洋舰队出海同英军作战,但基尔港的8万名水兵拒绝起锚。11月3日,水兵走上基尔街头游行示威,随后发展为武装起义,当地工人也举行武装起义响应,两者共同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以摧毁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为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德国全国迅速蔓延。几乎所有的德国大城市都发生了武装起义,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德国被迫宣布停战,一战由此结束,而试图推翻世界资产阶级统治的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则继续在中欧乃至世界产生影响,如匈牙利革命等。

与一战十分相似,二战也对现代世界体系产生巨大的冲击,但其是以确立两个平行的市场和社会主义阵营而对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形成巨大的挑战。正如1945年二战结束之际,斯大林对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米洛万·地拉斯所说的那样:“这场战争的进程与过去的战争决然不同,在谁占领的地区可以由谁来建立自己的社会体系……这场战争不可能有其他结果。”^[38]事实恰恰也正是如此,1946年2月9日,就在二战结束后不久,斯大林在莫斯科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发表公开演说指出:“我们的胜利说明:获得胜利的是我们的苏维埃社会制度,苏维埃社会制度在战火中胜利地经住了考验,并证明它具有充分的生命力。”^[39]正是苏维埃制度这样的生命力,才能在二战后通过建立起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平行的社会主义世界市场和社会主义阵营而改变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

十分明显,根据斯大林的看法,苏联在二战中的决定性作用是导致现代世界体系中无所不

包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瓦解的直接原因,因为正是苏联在二战中通过消灭法西斯侵略者而极大地改变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体系的力量对比,并使之向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40]之所以说二战后的世界局势是向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是因为社会主义开始从苏联一国向数国发展,并由此形成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平行的社会主义世界市场,以及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也就是说,现代世界体系从经济到政治因为二战而一分为二,形成对立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体系。客观的现实似乎也是如此,二战后,在苏联的努力推动之下,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平行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建立了起来,试图超越现代世界体系中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及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基本矛盾,从而转变现代世界体系发展演变的走向,乃至最终推翻这一现代世界体系,终结马克思所定义的世界历史。

从上述就一战、二战以及一战时期的大流感对现代世界体系及其内在基本矛盾的影响所作的简要分析可见,自现代世界体系成为全球性的体系之后,在很大程度上只有一战和二战可被视为对世界历史具有转折性影响的大事件,因为两者均对现代世界体系内在的基本矛盾的运作产生重要影响,并对构成现代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和主权国家国际政治体系形成明显的冲击。这也就是说,一战和二战使得对现代世界体系的否定成为可能,反体系运动得以真正展现出其作用。毋庸置疑,其他重大事件如俄国的十月革命、1929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冷战终结,以及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等,虽然也对现代世界体系的发展演变产生各种影响,但是却无法与一战和二战相提并论。比如俄国的十月革命本身就是一战所导致的结果,就如列宁所言,如果没有一战发生,在俄国的这场革命难以形成;1929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显然是现代世界体系中两大基本矛盾无法调和的结果,但

是却并没有动摇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和主权国家国际政治体系本身;同样,冷战的终结以及“9·11”恐怖袭击事件确实对国际政治体系具有明显的影响,却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现代世界体系内部的两大基本矛盾的运作,也不具有反体系的作用。要之,迄今为止,只有一战和二战具有从本质上改变现代世界体系的作用,因此对世界历史的走向具有转折性的影响。

然而,必须注意到的是,即便一战和二战对现代世界体系具有根本性的冲击力,并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转折性影响,但是现代世界体系却最终并未在反体系力量的作用之下而退出历史舞台,世界历史的发展演变在总体上依然还是继续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框架中运行,而并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转折。根据沃勒斯坦的说法,以世界体系核心区域的社会运动为标志及以边缘和半边缘区域的民族运动为标志的两种“反体系运动”都围绕是否应该用革命还是改良的方式推翻现存的世界体系展开,但是,“所谓革命运动取得政权通常是由于战时状态导致了现政权倒台而不是由于它们能够发动起义。正像有报道所说,1917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曾经说过:‘政权散落在大街上。’而一旦得到政权,运动(不管它们如何取得政权)就谋求维持政权,而这常常要求牺牲战斗性以及牺牲与别国运动的团结。”^[41]这就意味着,虽然沃勒斯坦所言的两种反体系运动,以及由一战所引起的反体系革命和二战所导致产生的与资本主义平行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市场,都一致反对现实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以彻底摧毁这一体系为终极目标,但是由于两者的政治目标都是夺取国家政权,因此,当这些运动在反体系的过程中夺取了国家政权之后,便由于受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主权国家国际政治体系运行的制约,减弱了曾经是它们存在理由的“反体系”目标,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还增强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力量。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一战以及1918—1919年流感大流行的作用之下,作为帝国主义时期反

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先行者和东西方反体系运动桥梁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掀起一阵世界革命的浪潮之后,终于在20世纪20年代初世界革命进入低潮之后,顺应现代世界体系的国际政治轨道而建立起与主权国家毫无二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从而回归到了现代世界体系的主权国家国际政治体系之中。尽管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在二战前推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政策,并藉由二战的推动而建构起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所平行的社会主义世界市场和社会主义阵营,试图以此战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但是,最终却难以超越现代世界体系内在经济和政治运作规律,以致转而成为现代世界体系之中的霸权国家,其随后的一系列霸权行为不仅不反体系,而且在客观上帮助着现代世界体系度过各种危机。^[42]

更重要的是,二战后,现代世界体系中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在贸易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乃至知识结构等层次上的不断整合和一体化形成了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浪潮。二战后的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就在于,随着世界市场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全球的产品、服务和资本通过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直接的和间接的)和国际化生产高速度、大容量地跨国界流动,各种资源的利用和配置也因此大大地越出民族—国家的疆界,在相当程度上,人口或劳务也通过移民不断地在全球范围内跨国流动。所有的一切导致二战后的世界市场经济体系深度一体化整合,由二战所导致的两个平行市场也因此难以实质性地维持,即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尽管一度面临着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大挑战,但是却有惊无险地继续主导着全球经济事务的发展演变。

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跨国界、大容量、高速度的流动不仅使世界市场更为深入地跨国界紧密相联,而且即使在冷战的环境中也促使世界各国的国内和国际事务、政治和经济事务不断地相互联结。就

如英国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斯特兰奇曾经指出的那样,“生产结构的变化改变国家的性质。国家的能力改变了,国家的责任也变了。大家熟悉的国际关系(包括国际经济关系在内)范畴——大西洋联盟、苏联集团、第三世界等——逐渐失去了它们一度似乎具有的同质性。”^[43]随着各国的内政和外交、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日益紧密,二战后的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体系在继续维持着无政府状态的同时,也展现出某种新的面貌,即首先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不断加强,接着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出现不同程度的相互依存,以至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矛盾得以某种程度的缓和,从而避免了类似于一战和二战这样的世界大战,并且促使冷战得以和平地终结。^[44]

冷战的终结导致西方学术界产生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该论说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随着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对立的冷战的终结,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部不再存在足以瓦解该体系的“矛盾”(contradictions)。即便诸如经济、技术、环境,以及更为严重的犯罪和毒品等问题依然存在,但这些“问题”(problems)都能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中自行解决。由于根据黑格尔甚至马克思的学说,过去的历史是通过辩证的或矛盾的运动,由一种社会形态替换前一种社会形态,而自由的民主制资本主义社会因其内部不再存在“矛盾”,所以自然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后一种社会形态,历史也就在这一时代宣告终结。福山写道:“除非‘问题’(problems)严重到不仅不能在体系之中得到解决,而且还会腐蚀体系本身的合法性,以致体系因此达到自行崩溃的程度,‘问题’就不会成为‘矛盾’(contradictions)。比如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持续的贫困是一种‘矛盾’,而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它会导致某种革命的形势,这种革命形势会推翻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并且由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取而代

之。相反,我们不这么认为,如果目前的社会形态和政治结构完全能在最根本的特征上满足人类的要求,那么历史就已经到了尽头。”^[45]

然而,现代世界体系在冷战后的发展演变则彻底地否定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虽然冷战的终结导致全球化更为深入和广泛地发展,但是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两对基本矛盾并未由此而退出历史的舞台。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是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经济危机及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随着现代世界体系的不断发展,在二战后位于核心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了避免经济危机,稳定社会,主动进行所谓福利国家的制度设计,在保护生产资料(资本)私人占有的前提下,通过政府的干预和调节来缓解这一矛盾,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是,随着二战后尤其是冷战终结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产业资本的跨国输出和金融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致使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更为复杂难解,因为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设计也首先是为私有资本的占有者服务,为了保障资本的无限度盈利,政府尽可能减少对资本全球性流动的干预,同时在国内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尽量压低社会福利水平。由此,现代世界体系内部尤其是处于核心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十分容易在国内产生周期性和结构性的财富集中和分配不均等顽疾。

同样,根据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只要主权国家依然是现代国际政治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世界市场与主权国家之间的矛盾就难以退出历史舞台。从整个现代世界体系的发展史中可见,主权国家的疆界分割了世界市场,国家利益与世界市场的经济利益不断地发生激烈冲突,以致国家与市场这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难解的矛盾最终导致一战与二战。二战后,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一系列协调国家与市场之间矛盾的国际机制应运而生,促进世界

市场深层次地整合与不断地一体化,西方国家之间由此而避免了因争夺世界市场而导致的战争。但是在冷战后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特别是大量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后,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财富分配中的支配地位受到削弱,从而导致在进入21世纪之后,西方的民族主义再度抬头,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民族主义思潮在欧美国家迅速蔓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重新抬头的民族主义与欧美右翼民粹主义有所结合,形成了所谓的民粹民族主义。民粹民族主义十分推崇民族国家利益,要求民族国家保护本民族利益,在国际上则祭起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大旗,反自由贸易、反资本输出、反区域一体化,要求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去全球化,如采取贸易保护主义、限制对外直接投资、拒绝接受难民、排斥外来移民以及退出一系列国际机制等。^[46]这一切毫无疑问加剧了现代世界体系中固有的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矛盾,以至于历史不仅没有终结,反而在现代世界体系的两对基本矛盾更为复杂的冲突与斗争中发展演变,全球化则因此而进入低潮期且逆全球化潮流高涨。^[47]毋庸置疑,新冠病毒大流行正是在世界历史及现代世界体系进入21世纪的全球化退潮大背景下爆发的。

从上述考察一战(包括1918—1919年流感大流行)及二战对现代世界体系的重大影响,以及分析当前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可见,总体而言,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视角作探索,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并不会对现代世界体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也即世界历史不可能因新冠病毒的大流行而出现根本性的转折。可以预判的是,新冠疫情过后我们将继续生活在本质上与新冠病毒全球流行之前相同的世界之中,因为现代世界体系在本质上不会因此次新冠疫情而发生改变,即使是像一战及与之相伴的1918—1919年流感大流行和二战给现代世界体系所带来的那种形式上的改变也不会发生,即现代世界体系中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主权国家国际政治体系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不会

遭到诸如一战和二战所导致的否定性冲击。

四、新冠疫情后的世界走向不会发生根本性转折的原因分析

通过考察分析新冠疫情对现代世界体系中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和主权国家国际政治体系的影响,我们可以进一步找到新冠疫情之后世界走向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原因。

首先,与一战以及伴随的1918—1919年流感大流行不同,新冠病毒的全球性流行不可能形成冲击乃至否定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体系的革命,也不会导致产生诸如二战后所形成的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平行的社会主义世界市场。这也就是说,从世界经济层面看,新冠疫情并不会冲击现代世界体系中世界市场的运行方式,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体系的本质,当然也不会因此而形成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平行的任何其他形式的市场体系。不可否认,世界经济会因为新冠病毒大流行而出现明显的衰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20年4月14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由于疫情,2020年全球经济预计将急剧收缩3%,比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的情况还要糟糕得多。”(参见下页表1)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就此将会分崩离析,就在同一份报告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基线情景假设疫情在2020年下半年消退,防控措施可以逐步取消,在这一情景中,随着政策支持措施帮助经济活动恢复正常,全球经济预计在2021年将增长5.8%。”^[48]

更重要的是,在2020年3月26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发表声明指出:“我们承诺竭尽所能,使用现有一切政策工具,降低此次大流行病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损害,恢复全球增长,维持市场稳定并增强经济韧性。”^[49]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更是在特别峰会的发言中明确地提出:“疫情对全球生产和需求造成全面冲击,各国应该联手加大宏观政策对冲力度,防止世界经济陷入衰退。要实

表 1 《世界经济展望》最新增长预测

(实际 GDP, 年度百分比变化)	预测值		
	2019	2020	2021
世界产出	2.9	-3.0	5.8
发达经济体	1.7	-6.1	4.5
美国	2.3	-5.9	4.7
欧元区	1.2	-7.5	4.7
德国	0.6	-7.0	5.2
法国	1.3	-7.2	4.5
意大利	0.3	-9.1	4.8
西班牙	2.0	-8.0	4.3
日本	0.7	-5.2	3.0
英国	1.4	-6.5	4.0
加拿大	1.6	-6.2	4.2
其他发达经济体	1.7	-4.6	4.5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3.7	-1.0	6.6
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5.5	1.0	8.5
中国	6.1	1.2	9.2
印度	4.2	1.9	7.4
东盟五国	4.8	-0.6	7.8
欧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2.1	-5.2	4.2
俄罗斯	1.3	-5.5	3.5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0.1	-5.2	3.4
巴西	1.1	-5.3	2.9
墨西哥	-0.1	-6.6	3.0
中东和中亚	1.2	-2.8	4.0
沙特阿拉伯	0.3	-2.3	2.9
撒哈拉以南非洲	3.1	-1.6	4.1
尼日利亚	2.2	-3.4	2.4
南非	0.2	-5.8	4.0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5.1	0.4	5.6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20年4月, <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4/14/weo-april-2020>。

施有力有效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促进各国货币汇率基本稳定。要加强金融监管协调,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将加大力度向国际市场供应原料药、生活必需品、防疫物资等产品。”^[50]2020年6月7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再度强调:“疫情在全球传播蔓延,人员流动、跨境商贸活动受阻,金融市场剧烈震荡,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双重打击,世界经济深度衰退不可避免,国际社会联手稳定和恢复世界经济势在必行。中国愿同各国

一道,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同时,一齐应对日益上升的全球经济衰退,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安全与畅通。”^[51]由此可见,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主要经济体都承诺要在新冠疫情之后通过有效的合作维护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应对全球经济衰退,而不是对之进行革命或建构一个平行的市场与之抗衡。

其次,但不是次要的,新冠病毒的全球性大流行也不可能像一战及1918—1919年流感大流行和二战那样,形成否定主权国家国际政治体系

的冲击波,即新冠疫情既不可能引起以消灭主权国家、彻底摧毁现存国际政治体系为宗旨的世界革命,也难以形成以否定现存主权国家国际政治体系为目标的革命阵营。事实恰恰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新冠疫情反而会更加强国际政治体系中主权国家的力量,促使主权国家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体系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从而使得现代世界体系的国际政治之翼加速向着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经典形态回归。

所谓国际政治体系的经典形态是指主权国家完全主导着现代世界体系中国际政治领域的诸事务及其发展演变的方向。自二战终结之后,虽然以苏联为首建构而成的社会主义阵营最终未能改变现代世界体系中由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体系的本质,但是在全球化的作用之下,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与国际政治体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高度网络化、时空紧缩化、跨国参与不断强化、经济边界加速退化、政治疆界逐渐淡化。就如小约瑟夫·奈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化主要指那些具有根本性重要意义的变化。这些变化业已对经济、军事、环境乃至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2]然而,随着进入21世纪,全球化在2008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之后出现明显的退潮,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潮流高涨,民粹民族主义再度兴起,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国际政治领域因二战后全球化而形成的主权国家政治疆界的淡化遭遇严峻的挑战,国际政治体系向着英国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利维坦》中所描述的国家与国家共存的经典“自然状态”回归。^[53]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则明显地加速了国际政治体系向主权国家政治经济疆界不断强化的方向回归。就如当年霍布斯所言的那样,“国王和最高主权者由于具有独立地位,始终是互相猜忌的,并保持着斗剑的状态和姿势。他们的武器指向对方,他们的目光互相注视;也就是说,他们在国土边境上筑碉堡、派边防部队并架设枪炮;还不断派间谍到邻国刺探。而这就是战争的姿态。”^[54]

虽然新冠疫情并未导致国际政治体系中的主权国家进入战争的姿态,但是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主权国家各自为政、以我为主、强化政治疆界的表现则十分突出。就如罗德里克所言,“不同国家以各自普遍存在的治理性质所能预见的方式应对这场危机。特朗普的无能、笨拙、自我吹嘘应对危机的方式,尽管是要命的,但是却不足为奇。巴西同样的爱虚荣和多变的贾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总统则一直以固有的态度淡化疫情风险。”^[55]更有甚者,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新冠疫情期间于2020年4月14日宣布,美国暂停向世界卫生组织(WHO)缴纳会费,并在5月29日以世卫组织“拒绝执行美方所要求的改革”为由,提出美国将终止与世卫组织的关系。^[56]显然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如此行径是进一步将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国际政治体系回推至否定国际机制和国际合作的经典“自然状态”。

在欧洲,已于2020年1月脱离欧盟的英国试图以自身独特的“群体免疫”方式应对新冠疫情,而欧盟成员国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危机中只顾自身利益、缺乏团结意识,且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在新冠疫情中反应不力,当诸如意大利等国遭受新冠疫情严重打击时,欧盟不仅没有协调成员国之间的抗疫行动,而且听任其他欧盟国家袖手旁观,甚至还截留运往别国的医疗物资。就此,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于2020年4月初在意大利主流媒体撰文,为欧盟此前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道歉。^[57]虽然在7月21日,经过长达4天的艰苦谈判,欧盟各国领导人终于就总额高达7500亿欧元的为帮助受新冠疫情沉重打击的成员国的“复苏基金”达成协议,但是此次谈判十分艰难,所谓“节俭四国”的奥地利、荷兰、丹麦和瑞典坚决要求大幅缩减此前计划的5000亿欧元直接拨款,最终达成妥协,将直接拨款缩减到3900亿欧元,另外3600亿欧元以贷款形式用于各成员国恢复经济。同时应荷兰等国要求,欧盟还决定严格审查受援国经济改革计划,其他成员国有权在规定时间内就受援国提出的改革方案和执行

情况提出异议,并行使否决权,要求终止对其拨款。此外,作为妥协,在欧盟未来7年的1.074万亿欧元预算中,奥地利和荷兰将分别获得5.6亿欧元和19.2亿欧元预算减免。丹麦和瑞典两国也得到了不错的减免额度。^[58]这显示出欧盟内部在英国脱欧之后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再国家化”因素。

最后,虽然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且新冠疫情对之确实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这一场大变局将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之中的变局。这意味着,参与变局的各方在主观上,以及大变局的客观发展并不会助推世界历史走向终结,现存的由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和主权国家国际政治体系所构成的现代世界体系并不会因此而被彻底推翻,从而建构起一个新的世界。

2017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回国参加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59]显然,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指的是整个世界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所发生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现代世界体系成为全球性体系百余年之后的今天所发生的世界市场体系中的经济动能转换、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力量对比变化,以及与这两者相关的全球治理体系重塑的精辟总结。^[60]正如现代世界体系在本质上不会因新冠疫情而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一样,新冠疫情也不可能阻止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就已经在当前的现代世界体系中开始形成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根本上而言,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成因主要在于现代世界体系内部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矛盾运动。

毫无疑问,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现代世界体系中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首先,新冠疫情对世界

经济的负面影响空前,导致了自1929至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以来全球面临的最为严重的危机;其次,新冠疫情在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同时,使得世界各国的失业率大大增加,进而影响消费;再次,新冠疫情使得世界各国经济的供给侧受到诸如封城(lockdown)等措施的严重影响;最后,新冠疫情加剧了全球财富分配不均。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世界体系中存在着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就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61]但是,当今世界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世界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将对缓和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产生重要的影响,而新冠疫情本身则对此具有相当的促进作用。首先,新冠疫情加速了近年来已开始出现的经济运作数字化转型;其次,新冠疫情促使全球企业加速提高自动化水平;最后,被称之为“远程移民”(telemigration)的新第三产业工作业态在新冠疫情中迅速扩散增长。正是由于新冠疫情明显地加速了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形成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因此,新冠疫情在加剧现代世界体系中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的同时,又能够缓和这一矛盾对整个体系的否定性冲击,从而使得现代世界体系中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得以在新冠疫情期间乃至在此之后仍将继续维持,以致在短期内不会发生革命性的巨变。

在国际政治体系领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现为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62]自进入21世纪之后,过去百余年来由西方欧美大国把持全球性国际政治体系中权力的时代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非西方国家的权力在新千年之后持续增强,导致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新冠疫情加剧了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国际格局方面

的种种变化。一方面,新冠疫情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冲击,导致西方大国更难在全球性的国际政治体系中维护自身的中心地位,新兴大国有不断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趋势,也即国际格局中力量对比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更加难以扭转。另一方面,新冠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现代世界体系中发达国家的“再国家化”。就如哈斯所言,“我认为,新冠疫情危机至少在未来几年内将导致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向内转向,将注意力集中在其境内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其境外发生的事情。”^[63]

当今世界所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国际格局方面的上述种种变化,以及新冠疫情对这一系列变化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是因为在现代世界体系之中,国家与市场矛盾运动的主要方面由市场向国家方向转移,而新冠疫情所导致的各国在处理疫情中的更为内向化则促使国家在国家与市场关系中向着更强势的方向发展。与此相互关联的是,国家与市场矛盾运动所形成的国家尤其是大国间的不平衡发展规律导致国际格局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形成了原先处于边缘与半边缘的新兴大国前所未有地群体性崛起,并且不断地走向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央。但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并不能彻底解决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国家与市场的矛盾,也不可能迅速地推动这一体系超越自身而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体系。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体系还将继续主导着现代世界体系中国际政治的发展方向,虽然其中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综上所述,可得出以下几方面的粗浅结论。

第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通过对世界历史和现代世界体系的发生、发展及全球性现代世界体系在当代演进的深入考察,我们能对当前新冠病毒大流行影响未来世界的走向作某种预测和判断,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认为:除了知道有此病毒之外,我们所知道的就是目前没有专家能推测出这场

危机的各种后果。

第二,厘清现代世界体系的发生、发展,分析其内在的基本矛盾,对考察、分析和预判新冠疫情对未来世界走向的影响极具实际价值。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于马克思所言的人类历史由地域性向世界性的转化。随着15世纪和16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西欧兴起,以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和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现代国际政治体系共同构成了现代世界体系。现代世界体系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展过程中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全球性的体系,就如列宁所说,“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

第三,现代世界体系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对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和主权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间的矛盾。这两对基本矛盾决定着全球的经济、政治的走向,对世界历史中的重大事件诸如世界经济危机、世界大战乃至全球性瘟疫等产生直接的作用与影响。同时,这些全球性的重大事件的发生、发展又反过来形塑现代世界体系内的这两对矛盾以及该体系自身的发展演变。当今新冠疫情与现代世界体系的发展以及该体系中两对基本矛盾的运作紧密相关。

第四,在现代世界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只有一战和二战对体系中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和主权国家国际政治体系,以及与之相连的两对基本矛盾产生实质性的冲击。而流感大流行因与一战之间的关系紧密也略具这方面的作用,其原因在于一战引起了否定现代世界体系的世界革命,而二战则导致战后形成两个平行的市场和对立的阵营。这两者都使对全球性的现代世界体系本身的否定成为可能,尽管最终现代世界体系并未在反体系力量的作用之下而退出历史舞台,迄今世界历史的发展演变在总体上依然还是继续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框架中运行。

第五,由于一方面,新冠病毒的全球性流行不可能形成冲击乃至否定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

济体系的革命,也不会导致产生诸如二战后所形成的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平行的社会主义世界市场;另一方面,新冠病毒的全球性流行也不可能像一战及1918—1919年流感大流行和二战那样形成否定主权国家国际政治体系的冲击,即新冠疫情既不可能引起以消灭主权国家彻底摧毁现存国际政治体系为宗旨的世界革命,也难以形成以否定现存主权国家国际政治体系为目标的革命阵营。因此,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并不会对现代世界体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即世界历史不可能因新冠病毒的大流行而出现根本性的转折。可以预判的是,新冠疫情过后我们将继续生活在本质上与新冠病毒全球流行之前相同的世界之中。

第六,由于新冠疫情对现代世界体系中两对基本矛盾的运作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因此,现代世界体系在其基本结构也就是其本质不变的前提下会形成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其中尤其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正是因为新冠疫情在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之中既加剧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矛盾,又在相当程度上对缓和这两对矛盾有一定的作用,因此,这两对基本矛盾运动将在新冠疫情之中及之后继续影响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未来世界将因此而继续在现代世界体系之中向着既充满矛盾又有利于新兴国家进入世界舞台中央的方向发展演变。

注释:

[1] Stephen M. Walt etc., “How the World Will Look After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Foreign Policy*, March 20, 2020.
 [2][7] Yuval Noah Harari, “The World After Coronavirus”, *Financial Times*, March 20, 2020.
 [3][13][14][15] Henry Kissinger,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Will Forever Alter the World Orde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3, 2020.
 [4][17] Dani Rodrik, “Will - Covid - 19 - remake - the - world”, Project Syndicate, April 6, 2020,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0, www.project-syndicate.org, distribution@project-

syndicate.org.

[5] “Jürgen Habermas über Corona: ‘So viel Wissen über unser Nichtwissen gab es noch nie’” (“Jürgen Habermas on coronavirus: ‘There has never been so much knowledge about our ignorance’” 《约根·哈贝马斯谈新冠病毒大流行:“我们从未如此地了解我们的无知”》), <https://www.fr.de/kultur/gesellschaft/juergen-habermas-coronavirus-krise-covid19-interview-13642491.html>.

[6] 参见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的相关报道:《“新冠疫情与世界大变局”研讨会在线上举行》,清华大学官网, <http://www.iccs.tsinghua.edu.cn/NewsSt/707.html>;以及《新冠疫情与世界格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疫情让世界变局来得更快更猛》,参考消息网, <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200602/2411977.shtml>。

[8] Introduction in “How the World Will Look After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Foreign Policy*, March 20, 2020.

[9] Stephen M. Walt, “A World Less Open, Prosperous, and Free” in “How the World Will Look After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Foreign Policy*, March 20, 2020.

[10] Robin Niblett, “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as We Know It” in “How the World Will Look After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Foreign Policy*, March 20, 2020.

[11] G. John Ikenberry, “Democracies Will Come out of Their Shell” in “How the World Will Look After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Foreign Policy*, March 20, 2020.

[12] Joseph S. Nye, Jr., “American Power Will Need a New Strategy” in “How the World Will Look After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Foreign Policy*, March 20, 2020.

[16] Lawrence Summers, “Covid - 19 looks like a hinge in history”, *Financial Times*, May 14, 2020.

[18][19] “Jürgen Habermas über Corona: ‘So viel Wissen über unser Nichtwissen gab es noch nie’”, <https://www.fr.de/kultur/gesellschaft/juergen-habermas-coronavirus-krise-covid19-interview-13642491.html>.

[20]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22—324页。

[21] 1918—1919年流感大流行也被称为“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但其起源并非在西班牙,只是因为当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各国都封锁流感大流行的消息,而作为中立国的西班牙则全面报道了国内的流感疫情,所以该次流感大流行被人们误称为“西班牙流感”。目前一般认为1918—1919年流感大流行的源头尚不确定,尽管最早发病的病例是在美国。

[22][23] Ken Mondschein, “The Coronavirus is not the Black Death”, <https://www.medievalists.net/2020/03/coronavirus-black-death/>.

[24][25][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6、276、276页。

[26][27][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

卷):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罗荣渠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2、80页。

[29]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51页。

[30]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8页。

[31]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43页。

[32]有关一战和二战起源的解释参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美]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宋承先、洪文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

[33]“Influenza pandemic of 1918-19” from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influenza-pandemic-of-1918-1919>.

[34]《列宁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页。

[35]《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30页。

[36]《列宁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06页。

[37]“Germany from 1918 to 1945” from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place/Germany/Germany-from-1918-to-1945>.

[38]转引自[美]约翰·刘易斯·盖迪斯:《我们现在知道了:对冷战史的重新思考》(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第14页。

[39]《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91页。

[40][苏联]安德烈·日丹诺夫:《两个阵营政策》,转引自盖尔·斯托克斯编:《从斯大林主义到多元主义:1945年以来东欧文献史》(The Two-Camp Policy by Andrei Zhdanov, September 1947 in Gale Stokes ed., *From Stalinism to Pluralism—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Since 19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第18页。根据目前中外学者对苏联档案的研究,日丹诺夫的报告完全是在斯大林的授意下完成的,而“两个阵营”的概念则是日丹诺夫请示了斯大林之后才正式公开提出的。参见沈志华:《1948年苏南冲突起因的历史考察——来自俄国及东欧国家解密档案的新证据》,《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

[41][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反体系运动在今天意味着什么》,路爱国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

[42]参见沃勒斯坦专著《历史资本主义》(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以及论文《反体系运动在今天意味着什么》中的相关讨论。

[43][英]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

与市场》,杨宇光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02页。

[44]有关二战后全球化对国际政治体系及冷战终结的影响的具体讨论参见叶江:《全球化市场与当代国际政治走势》,《学术月刊》2001年第9期。

[45][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36页。

[46]相关讨论参见叶江:《正确认识欧美民族主义再度抬头》,《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3日。

[47]叶江:《全球化退潮及民粹民族主义兴起对现代世界体系的影响》,《国际观察》2017年第3期。

[4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20年4月,IMF官方网站, <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4/14/weo-april-2020>.

[49]《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声明》,《人民日报》2020年3月27日。

[50]习近平:《携手抗疫 共克时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的发言》(单行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

[5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单行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

[52][美]约瑟夫·S·奈、约翰·D·唐纳胡主编:《全球化世界的治理》,王勇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页。

[53]相关的具体论述参见叶江:《全球化退潮及民粹民族主义兴起对现代世界体系的影响》,《国际观察》2017年第3期。

[54][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6页。

[55]Dani Rodrik, “Will-Covid-19-remake-the-world”, <https://www.gulf-times.com/story/660559/Will-Covid-19-remake-the-world>.

[56]《特朗普宣布美国将终止与世卫组织的关系》,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2020-05/30/c_1126051938.htm.

[57]《疫情当下,道歉能否换来欧盟团结》,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4/04/c_1125814504.htm.

[58]European Council, “Special European Council, 17-21 July 2020, main results”,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meetings/european-council/2020/07/17-21/>.

[59]参见张红:《百年变局迎来关键时期》,《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1月4日。

[60][62]《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7月26日。

[6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63]Richard N. Haass, “The Pandemic Will Accelerate History Rather Than Reshape It”,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20.

[责任编辑:刘姝媛]